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4-0496-06

# 布朗案判决后美国南部的象征性改革 对民权运动的影响

谢 国 荣

[摘 要] 1954年布朗案判决后,美国南部白人社会出现了名为执行判决实为阻挠落实判决的象征性改革。这种象征性改革激起了黑人社会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入座运动”、“自由乘客运动”、“伯明翰运动”和“向华盛顿进军”等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发展。这一系列直接行动不断突破象征性改革的束缚,加速了民权运动前进的步伐。象征性改革本质上是南部白人社会父权主义在种族关系上的体现,它企图安排黑人的命运,控制民权斗争的进程和方向。黑人社会认为,象征性改革是一种桎梏,要争取种族平等就必须冲破它的束缚。

[关键词] 布朗案判决;象征性改革;父权主义;民权运动;现在自由

[中图分类号] K705 [文献标识码] A

1954年布朗案判决后,美国南部白人社会不仅出现了对抗性反应,亦有名为执行判决实为阻挠落实判决的象征性改革。这种象征性改革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却遭到黑人社会激烈的批判。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认为,争取种族平等的最大障碍不是种族隔离主义者及其对抗性反应,而是白人温和派及其象征性改革。这有些出人意料,学术界对此亦是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分析南部白人社会的象征性改革对民权运动进程和结果的影响。

## 一、布朗案判决后南部白人社会在种族关系上的象征性改革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案作出一致判决,宣布“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不能在公共教育中实施,因为“隔离的教育设施根本是不平等”,“这样的隔离是对平等法律保护的否定”<sup>[1]</sup>(第39页)。这是美国现代宪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判决,打破了美国社会种族隔离制度的宪政基础,是在民权问题上的一次宪政革命。

布朗案的判决增加了黑人社会对民权斗争成功前景的信心。黑人民众大多认为,种族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已准备采取行动争取社会变革。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之一的罗伯特·威廉斯回忆说,他听到布朗案判决时的心情“如同昔日黑奴听到《解放宣言》那样激动”,“我敢肯定,这是美国民主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sup>[2]</sup>(第22页)。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准备好与遵守法律的民众一起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把这一判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消除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sup>[3]</sup>(第82页)。

与此同时,南部白人社会对布朗案判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强烈地抨击和抵制布朗案的判决,以南部腹地州为甚,如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佐治亚州的州长赫尔曼·塔尔马杰谴责最高法院把美国宪法撕成了“碎纸片”<sup>[3]</sup>(第92页)。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詹姆斯·伊斯兰德誓言蔑视任何对布朗案判决的强制执行,警告这样做将会带来“巨大的冲突和骚乱”<sup>[4]</sup>(第29页)。南卡

罗来纳州的议会甚至公开谴责这是联邦政府对州权的“非法入侵”<sup>[5]</sup> (第44页)。1956年,在种族关系问题上比较保守的南部政治人物公开在美国参议院中发表《南部宣言》,呼吁以合法的方式抵制布朗案的判决<sup>[6]</sup> (第160-161页)。

与南部腹地州不同,上南部州在种族关系领域是所谓的“进步主义州”,如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其中,北卡罗来纳州最具典型性。白人中的温和派在当地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不是一味地抵制种族关系变革,而是在布朗案判决后采取象征性改革,在极个别的公立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与此同时,这些州较少以暴力来回应当地黑人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诉求。

主张象征性改革的白人温和派认为,在取消种族隔离的漫长过程中,象征性的黑、白种族合校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当少量的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学习而没有造成种族之间的紧张时,那么这种成功的种族融合经验将会帮助白人克服内心的恐惧,这种心理治疗需要时间<sup>[7]</sup> (第98页)。白人温和派对民权运动颇有顾虑,担心它会导致白人的对抗性反应。他们主张“自由择校”计划,这意味着黑人因居住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仍会选择黑人学校,从而维持种族隔离制度<sup>[7]</sup> (第98页)。

在南部白人温和派看来,取消种族隔离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变迁的进程,世代交替终将会消灭种族偏见。但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就像移民融入美国社会那样漫长。他们认为取消种族隔离应分阶段进行,先从边界州开始,然后是上南部州,最后是南部腹地州。在此过程中,黑人社会需保持足够的耐心,不要动辄进行司法诉讼,应尽量避免刺激种族隔离主义者,否则会引起他们的反弹<sup>[7]</sup> (第99页)。

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尔萨尔计划是最具典型的象征性改革。在取消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问题上,北卡罗来纳州在1956年9月通过立法推行皮尔萨尔计划,允许白人社区自主选择是否关闭公立学校,避免公开抵制布朗案判决。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州和地方政府如果当地公民认为公立学校的条件不可容忍,那么可以投票决定是否关闭公立学校;二、如果家长反对子女参加黑、白合校,那么应该给予私立学校教育拨款;三、如果不能立即给那些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人的孩子提供种族隔离的学校,那么应该撤销强制性的就学规定<sup>[8]</sup> (第114页)。皮尔萨尔计划确保了绝大部分的白人孩子可以继续原来的公立学校上学。

1957年夏,按照皮尔萨尔计划,北卡罗来纳州中北部的格林斯博罗市开始了象征性的取消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改革。7月23日,格林斯博罗市学校委员会同意6名黑人孩子转入白人学校学习。格林斯博罗市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爆发之际主动取消种族隔离,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过程顺利,它因此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普遍称赞。《新闻周刊》赞美它是“新南部的象征,因新自由主义而闻名”,《时代》杂志称赞该市的行动是对种族隔离的“大胆进攻”<sup>[9]</sup> (第46页)。然而,1960年轰轰烈烈的“入座运动”,正是在这个城市首先爆发的。

北卡罗来纳的象征性改革为该州赢得了遵守布朗案判决第一州的美誉。因为它既避免了南部腹地州的对抗性反应,也避免了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的发生。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孩子是在种族融合的公立学校学习,但《新共和》在1959年赞扬该州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方面是“南部的样板”<sup>[7]</sup> (第109页)。同年,最高法院拒绝审理黑人对皮尔萨尔计划的起诉,认为它为解决南部种族隔离问题提供了蓝图<sup>[8]</sup> (第117页)。美国主流社会赞扬该州州长卢瑟·霍奇在处理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上找到了和平的道路。他因此经常受邀到各地介绍经验<sup>[8]</sup> (第117页)。

但在黑人社会看来,象征性的取消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不是胜利而是失败。统计数字显示,在1960年12月、1964年5月和1965年6月,北卡罗来纳州入读白人学校的黑人孩子分别是82、1,865和4,963人,只占黑人孩子的0.02%、0.537%和1.42%<sup>[8]</sup> (第117-119页)。到1965年,该州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同校学习的人数少于佛罗里达、田纳西、得克萨斯和弗吉尼亚州,只略多于亚拉巴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州,比整个南部地区低37%<sup>[8]</sup> (第117-119页)。由此可见,北卡罗来纳州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十分缓慢。然而,美国主流社会却称赞该州南部种族关系改革的榜样。这让黑人社会在布朗案判决后感受到了象征性改革的沉重压抑

在 50 年代中后期,马丁·路德·金已经意识到象征性改革是民权运动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期间观察到,白人温和派一直鼓吹渐进主义,但“他们现在意识到这种缓慢的方法也有革命意义”,“他们恳求黑人后退,以免发生社会失控”<sup>[10]</sup>(第 80 页)。1959 年 4 月 18 日,金在演讲中说,“完全取消种族隔离和实现平等的唯一答案就是现在”,“而不是等待,不是象征性改革”<sup>[10]</sup>(第 21 页)。他还撰文批评最高法院认可像皮尔萨尔计划这样的象征性改革,使“争取民权的斗争处于严重危机之中”<sup>[10]</sup>(第 31-32 页)。

黑人民众认为,象征性改革是种族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以拖延的方式来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正如小石城的一位官员所言,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想出了“一个使种族隔离永久化的最聪明的方法”<sup>[9]</sup>(第 70 页)。与布朗案判决后的期望和兴奋相比,黑人社会在 1950 年代末对象征性改革感到失望、痛苦和愤怒。格林斯博罗市那些曾经“兴奋和合作”的黑人现在变得“缄默和质疑”,极为沮丧,“到了充满种族怨恨的边缘”<sup>[9]</sup>(第 60 页)。

象征性改革激化了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在种族关系改革上的矛盾。白人社会认为黑人前进太快,黑人在文化上没做好实现学校种族融合的准备,需要数十年来提高文化水平。如果现在就实现学校种族融合,那将会使白人在文化教育上倒退一代,因此目前只能实行象征性改革<sup>[10]</sup>(第 211 页)。但黑人社会认为象征性改革只是对种族融合原则的肯定,没有实质性变化<sup>[10]</sup>(第 32 页);象征性的种族融合不是虔诚信念的开始,而是精心设计的新的种族歧视形式<sup>[10]</sup>(第 96 页)。

对黑人民众而言,此时南部白人温和派的象征性改革不再具有“进步”的意义。他们争取种族平等的激情已被布朗案的判决点燃,渴望出现一个种族关系的新时代。在布朗案判决前,种族关系领域的象征性进步往往会受到黑人社会的肯定,因为那时种族隔离在宪法上是合法的。但如今最高法院已经判决“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违宪,而象征性改革却使黑人社会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黑人社会对象征性改革的造反导致了“入座运动”的爆发。1960 年的“入座运动”大多发生在种族关系上“更进步的上南部州,尤其是在南部州的大城市中心”<sup>[11]</sup>(第 287 页)。

黑人青年学生成为造反的主角。他们是在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像父辈那样生活在南部农村,而是生活在与外界有更多联系的城市。城市生活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越来越不满象征性改革的种种托词。在他们看来,“渐进主义是一种诅咒”,因为“他们对被承诺的权利已等待一个世纪之久了”<sup>[7]</sup>(第 102 页)。他们纷纷表示,“不能等那么久,也不愿再等待”,而“现在自由!”则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sup>[10]</sup>(第 163 页)。耐心等待渐进主义改革和依靠最高法院判决带来社会变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采取直接行动的时候了。

## 二、黑人社会非暴力直接行动对象征性改革束缚的突破

1960 年 2 月 1 日,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四名黑人大学生在格林斯博罗市采取了抗议活动。他们来到伍尔沃斯连锁店,要求在午餐店得到像白人一样的服务,但服务生告诉他们这里不向黑人提供服务。这些学生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入座。第二天他们又来到这里,尽管没有得到服务,但还是坚持入座抗议。结果入座队伍越来越大,“入座运动”作为一种抗议模式传播开来。到 1960 年 4 月,南部州和边界州有 78 座城市发生了“入座运动”,2,000 多名学生被捕。有历史学家认为,“入座运动”是“民权运动史上的分水岭,美国的种族关系将不会是以前那样子了”<sup>[12]</sup>(第 64 页)。

“入座运动”是黑人社会反对象征性改革的直接体现。马丁·路德·金指出,“‘入座运动’是对象征性改革的造反。人们对此还不理解,认为黑人会满意象征性的种族融合”,但这“不是民权运动的目标,黑人的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种族融合。”他说,民权运动是在“许多已采取象征性种族融合的社区中成长起来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表明种族融合必须是真实和完整的,而不只是象征性的”<sup>[10]</sup>(第 52 页)。“入座运动”说明,黑人社会在取消种族隔离上不再认同温和派的“时间神话”。温和派主张时间可以解决一切,但种族隔离主义者在利用时间上更有效。马丁·路德·金指出“援助时间是必要的,否则

时间会成为消极的力量,帮助南部社会在取消种族隔离上停滞不前”<sup>[10]</sup>(第 52 页)。

“入座运动”在民权运动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马丁·路德·金认为,“它意味着争取自由的时候已经到来”,为了自由,黑人青年把“被捕看作是一种荣誉”<sup>[10]</sup>(第 160 页)。黑人社会厌倦了等待白人去行动的说法,并在“入座运动”后认识到,“未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不是在国会和最高法院,而是在监狱中获得”<sup>[11]</sup>(第 72 页)。“入座运动”表明,“不是所有的南部黑人都满意他们的命运,对改革的需求不是来自外面”,“争取实现自由就是现在”<sup>[12]</sup>(第 69 页)。

“入座运动”后,象征性改革依然是民权运动前进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白人温和派强调时间和耐心,不采用激烈的手段来回应黑人的民权诉求。因此,上南部州很难出现黑、白种族激烈对抗的局面。这也使得上南部州的民权活动难以长期吸引媒体、民众和联邦政府的关注,民权运动只能转向南部腹地州。

1961 年,“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詹姆斯·法默发起了穿越南部州的“自由乘客运动”。这既是受“入座运动”的鼓舞,也是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法默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激怒南部当局。当它逮捕我们时,就会迫使司法部介入其中,执行美国法律”<sup>[13]</sup>(第 88-89 页)。他表示,“我们正利用南部的顽固派来做我们的工作”,“通过制造危机来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做出反应”<sup>[13]</sup>(第 64 页)。

这引起了肯尼迪政府的担忧。为此,它鼓励黑人在上南部州从事“选民登记运动”,愿意提供财政支持和安全保障,以便把抗议引向“更安全的方向”<sup>[13]</sup>(第 80-81 页)。这是让黑人放弃示威运动,使民权运动“冷却”下来<sup>[2]</sup>(第 104 页)。白人温和派也反对“入座运动”和“自由乘客运动”。他们表示,如果民权运动推进太快,那么黑人会由于白人的对抗性反应失去来之不易的收获<sup>[10]</sup>(第 165 页)。如果黑人保持耐心,那么时间自然会解决问题。他们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民权立法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不能改变白人的内心世界<sup>[10]</sup>(第 213 页)。

黑人社会接受了肯尼迪政府提出的建议。一部分人继续从事直接行动,另一部分人从事“选民登记运动”。黑人激进派领导人戴安·纳什的推测变成了现实,“选民登记运动”既没有立即取得重大的收获,也没有轰动性的新闻<sup>[2]</sup>(第 104 页)。1962 年,马丁·路德·金参加了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运动”,但遭到了白人温和派的算计。警察局长劳里·彼瑞特切特虽然大肆逮捕民权示威者,但尽量避免发生暴力和冲突。联邦政府默许这一做法,认为逮捕抗议者与种族问题无关<sup>[2]</sup>(第 116 页)。然而,自黑人社会接受肯尼迪政府的建议后,民权活动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民权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在马丁·路德·金看来,美国政府的象征性改革发生了作用,公众接受了象征性改革,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和令人满意的进步”<sup>[10]</sup>(第 112 页)。

这种情况激起了马丁·路德·金的不满。1961 年 6 月 6 日,他发表演讲批判象征性改革<sup>[10]</sup>(第 214 页)。11 月 16 日,他在演讲中劝白人温和派放弃象征性的种族融合,接受“入座运动”和“自由乘客运动”<sup>[10]</sup>(第 43 页)。1962 年 7 月 19 日,他批评“有计划的和制度化的象征性改革”是捍卫种族隔离的新手段,是精心设计的拖延种族融合的方式,是民权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sup>[10]</sup>(第 100 页)。他说,“如果象征主义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政府帮助我们实现了它”,“但它不仅是无用的目标,而且是巨大的威胁”,它“只会阻止我们进步”<sup>[10]</sup>(第 113 页)。

为了打破白人温和派关于黑人满意象征性改革和民权运动前进太快的神话,1963 年初,“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选择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开展民权示威活动。它认为,当地警察局长尤金·康纳极有可能以暴力来回应那里的民权运动。这能吸引媒体关注,形成社会压力,迫使肯尼迪政府和国会制定强制性的民权立法。为了制造社会影响,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运动”中不惜发动黑人孩子进行游行示威,这遭到了白人温和派的猛烈批评。对此,马丁·路德·金在《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反唇相讥。他说:“过去几年我对白人温和派失望透顶。黑人迈向自由的最大障碍不是白人公民理事会和三 K 党而是白人温和派。白人温和派更致力于社会秩序而非正义,……总是说同意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不同意直接行动的方法。他们总是家长制作风,认为可以替别人的自由制定时间表。……他们总是建议我们等待。……他们的空谈理解比邪恶者的误解更伤害我们的事业”<sup>[10]</sup>(第 156-157 页)。

基于“伯明翰运动”的巨大影响,肯尼迪总统承诺推动民权立法。1963年6月11日,他在华盛顿发表电视演讲,呼吁给美国黑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6月19日,他向国会提交了民权和工作机会特别咨文。他说:“国会加入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行列,向社会清楚地表明种族歧视和隔离在美国法律和生活中没有地位,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建议国会通过一揽子的法案,它就是1963年民权法。”<sup>[14]</sup>(第199页)但肯尼迪希望街头运动止于伯明翰,担忧民权组织发起的“向华盛顿进军”不仅会导致种族暴力,而且会危及政府的民权立法努力。

然而,黑人民权则力主“向华盛顿进军”。他们不认同肯尼迪总统的看法。菲利普·伦道夫说:“黑人早就在街头从事民权运动,……由负责任的组织来领导他们不更好吗?”马丁·路德·金表示,“这不是选择示威还是选择立法的问题。‘向华盛顿进军’可以让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满腹怨气的民众在非暴力下发泄不满。”法默认为,“如果我们取消了这次运动,又在民权立法的战斗中失利了,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极其困难,民众的不满会发展为暴力”<sup>[12]</sup>(第148-149页)。

1963年8月28日,20多万美国民众举行了华盛顿特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迫于民权运动的压力,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1964年2月10日和7月2日通过了带有强制性措施的《民权法》。但在同年的总统大选中,白人温和派再度指责民权运动前进太快。他们表示,白人社会将会对民权运动的“进攻性”和“过分要求”作出对抗性反应<sup>[10]</sup>(第177页)。马丁·路德·金回应说,“白人社会呼吁黑人拒绝暴力却不进行社会变革,这是向非正义屈服”<sup>[10]</sup>(第179页)。民权活动者继续在美国南部腹地州进行选民登记活动,并发起了1964年“自由夏季运动”。1965年,约翰逊政府回应黑人对选举权的诉求,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选举权法》。至此,美国法律中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得以清除。

### 三、象征性改革的本质及其对民权运动的制约

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后,白人社会认为,民权问题不再是美国首要的国内问题,民权运动已实现目标,应该结束。但黑人激进派民权领袖认为,民权运动应关注黑人下层社会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在马尔科姆·X的影响下,黑人社会提出了“黑人权力”的口号。民权运动随之由美国南部转向北部以及其它地方。

“黑人权力”运动放弃种族融合目标、排斥白人参与、主张黑人自卫、不再坚持非暴力战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黑人权力”运动的激进主张和不断出现的城市骚乱,让白人社会感到恐惧。白人社会从道义、舆论和资金上急剧减少对民权活动的支持。不仅如此,白人社会还在各个方面对民权运动进行破坏,制造民权组织之间的矛盾,诋毁民权领袖的形象。

马丁·路德·金虽然不赞同“黑人权力”运动,但十分不满白人温和派借机抹黑民权运动,转移对黑人贫困问题的关注。1968年4月,在被暗杀前夕,他批评美国国会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和反贫困的拨款。他指出,黑人虽然耐心等待,但希望总是落空,尽管美国在不断进步,但黑人的处境却在不断恶化。他表示,非暴力运动是为了避免全国性的灾难,在美国社会创造出一种新的阶级的和种族的和谐精神<sup>[10]</sup>(第71页)。但民权运动未能消除种族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可以说,南部白人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以及黑人长期不能享受平等权利的社会状况,是黑人社会不满乃至发动大规模的民权运动进行反抗的根本原因。民权运动的兴起是黑人社会政治意识觉醒和民权组织努力的结果。然而,南部白人社会如何回应黑人民权斗争的要求,则影响到了民权运动的发展和结果。

南部白人社会的象征性改革本是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平等格局的反映,也是为了维护这种格局。一方面,白人温和派认为冲突在本质上是坏的,在任何问题上发生冲突都会撕碎社会和谐脆弱纤维。他们相信,只要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那么种族主义能照旧下去。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白人应对黑人负有社会责任<sup>[9]</sup>(第7页)。也就是说,白人温和派在种族关系领域有两大特征:一是坚持白人种族对黑人种族的父权主义;二是在种族关系改革中坚持渐进主义<sup>[15]</sup>(第78页)。

本质上,象征性改革体现的是白人种族的父权主义。它企图安排黑人的命运,控制民权斗争的进程和方向。象征性改革强调需要时间、耐心和等待。白人温和派认为,任何象征性的改善都会令黑人满意和心存感激。但象征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种族隔离。象征性改革的结果表明,它是在拖延时间,不利于黑人取得平等权利。象征性改革在种族关系领域不是一种进步,反而成为黑人社会争取民权的最大障碍。黑人社会认为象征性改革是一种桎梏,必须突破它才能前进。

非暴力直接行动一直在艰难地突破美国历史上形成的白人权力的父权结构。黑人社会要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就必须冲破白人父权主义设置的藩篱。这反映的是美国历史上以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之间一直存在的深刻的矛盾。为了争取种族平等和自由,黑人社会越来越不满意于白人社会倡导的象征主义的种族关系改革。在反对南部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平等的斗争中,黑人社会无论是在斗争战略还是在斗争目标上越来越激进化。黑人社会日益激进化的民权运动反过来又与白人社会象征主义的民权改革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贯穿民权运动的始终。这既影响了民权运动的进程,也制约了民权运动的成就。民权运动的成就和局限反映了黑人社会对平等的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的需求,与白人社会父权文化所能接受程度之间的冲突。民权运动过后,美国黑人仍然在经济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白人文化中的父权主义制约了黑人社会对社会成果的平等分享。

#### [参 考 文 献]

- [ 1 ] Levy, Peter B. 1992.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 2 ] Stikoff, Harvard. 1981.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8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 3 ] Carson, Clayborne. 1991. *The Eyes on the Prize: 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s,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 4 ] Salmond, John A. 1997. “My Mind Set on Freedom”: *A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54—1968*. Chicago: Ivan R. Dee.
- [ 5 ] Marable, Manning. 1984. *Race, Reform and Rebellion: 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 in Black America, 1945—1982*.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 6 ] Levy, Peter B. 1998.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 [ 7 ] Jackson, Walter A. 1996. “White Liberal Intellectuals: Civil Rights and Gradualism, 1954—60.” in Ward, Brian & Tony Badger. *The Making of 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 [ 8 ] Wilkins, Wilma Peebles. 1987. “Reactions of Segments of the Black Community to the North Carolina.” *Phylon* 48 (2).
- [ 9 ] Chafe, William H. 1980. *Civilities and Civil Rights: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and the Black Struggle for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0 ] Washington, James. 1986.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 [ 11 ] Oppenheimer, Martin. 1963.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the 1960 Sit-Ins: Some Clues for Social Action.”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32 (3).
- [ 12 ] Cothran, Tilman C. 1965. “The Negro Protest against Segregation in the South.”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57.
- [ 13 ] Lawson, Steven F. 1991. *Running for Freedom: Civil Rights and Black Politics in America since 1941*.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 14 ] Sorensen, Theodore C. 1988. “Let The Word Go Forth.” *The Speeches, Statements, and Writings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 [ 15 ] Badger, Tony. 1996. “Fatalism, Not Gradualism: The Crisis of Southern Liberalism, 1945—65.” in Ward, Brian & Tony Badger. *The Making of 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